

曾国藩家书

三种合编

钟叔河 ● 整理 校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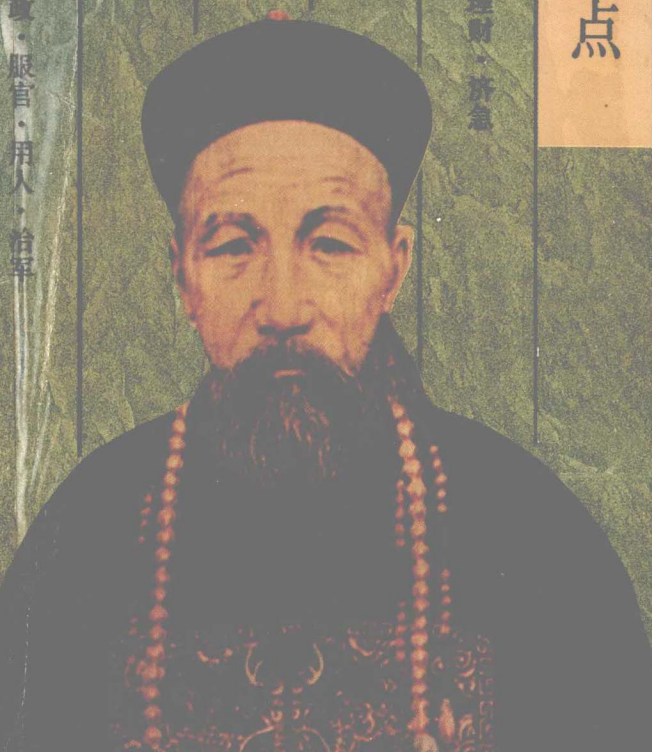
修身·齐家·助学·理财·济急

□ 教子书

□ 与弟书

□ 与祖父、父、叔书

交友·为政·服官·用人·治军



曾国藩家书三种合编

钟叔河 整理校点

北岳文艺出版社

(晋)新登字 2 号

社长:马森彪
总编
责编:石铁农

曾国藩家书三种合编

钟叔河 整理校点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1.25 字数:570 千字

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山西第 2 次印刷

印数:5 001—12 000 册

*

ISBN 7-5378-1374-4

I·1352 定价:19.80 元

序 言

钟叔河

《曾国藩家书三种合编》是我取的书名，所谓三种，即《曾国藩教子书》、《曾国藩与弟书》和《曾国藩与祖父、父、叔书》，都是我所选编并单行出版过的书。

《曾国藩教子书》选编于1986年，曾由岳麓书社印行；《曾国藩与弟书》选编于1988年，曾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印行；“与祖父、父、叔书”则是湖南大学出版社请我整理校点的世界书局本《曾国藩家书》中的一个部分。曾氏家书虽有全集本、原刻本和手书影印本行世，但我选编的这三种书，一直拥有自己的读者。我本人每年都要收到不少读者来信，反映想买书买不到，要我帮忙。书早就脱销了，唯一的办法只有重印。可这三种书都没有同出版社签订合同，无法援引国家版权局颁布的图书出版合同标准样式的第15条要求出版社重印；出版社也一直没有找我签订合同，在我看来这就是他们并没有想重印的意思。我正在为无法回复热心的读者而苦恼的时候，北岳文艺出版社给素无联系的我来信，请求我将《教子书》《与弟书》加上“与祖父、父、叔书”的内容修订合编为一册曾国藩家书的选读本，并表示愿意签订合同，彼此承担义务，我就表示同意了。

这三种书出版时，我各写了一篇序言，现在三书合为一册，我要讲的话却没有多少改变，故仍将各序印在下面，只作了少数几处必要的修改。

（一）关于教子书

在戏台上，“衙内”是个不受欢迎的脚色。在口头上，“大少爷”是低能纨绔的别名。可敬的鲁迅先生，也讲过几句颇为有点不敬的话；大意是说，一个人的学问能力，这跟花柳病不同，并不能经由性交传给对方和子女。事实也确乎如此，咱们中国虽有“龙生龙，凤生凤”的格言，威风和神龙生出来的却未必是小龙和雏凤。尧帝爷天

生圣明，丹朱却有名地不肖。李白诗篇万古传，他给儿女取的名字也颇有诗意，却谁也不曾见过明月奴诗集或玻璃诗钞。“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谪仙之才，二世而亡，岂不哀哉！

“可怜天下父母心”。普天之下的父母，除了埋儿的郭巨、杀女的王玉辉（借用吴敬梓创作的典故），大约无不愿子女能成龙变凤，或乘龙跨凤，至少也得攀龙附凤；而少爷小姐们却往往不争气，甚至甘居下游，蜕化成了夜游的恶鸟和懒蛇。老爷太太花钱费力，结果却只造就出一辈又一辈的高衙内和孔二小姐，徒然给后世戏台和当代街谈巷议提供笑骂之资，谓之可怜，其谁曰不宜。

我是愿意了解历史的，这里所说，当然只限于历史上的情形。可是，在清朝咸丰同治时期的达官贵人中，至少也有一个例外。此人在教育子女方面，可以说是获得了完全的成功（当然是以他自己的标准来衡量）。这个人就是敝同乡曾国藩。

曾国藩权绾四省，位列三公，拜相封侯，谥称“文正”，他的儿子，可算是正牌高干子弟了。然而，曾纪泽和曾纪鸿都没有变成“衙内”和“大少爷”。曾纪泽诗文书画俱佳，又以自学通英文，成为清季著名外交家；曾纪鸿不幸早死，研究古算学也已取得相当成就。不仅儿子个个成材，曾家的孙辈还出了曾广钧这样的诗人，曾孙辈又出了曾昭抡这样的学者，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就在于曾国藩教子有方，“爱之以其道”；而且他的教子之方，还多多少少传了下来，影响及于更久和更广。

曾国藩的教子之方，集中体现在他从咸丰二年到同治十年（即公元1852年至1871年）二十年间写给两个儿子的书信里。其成功的经验主要有三：

一、对于子孙，只求其读书明理，不求其做官发财，也不求其勉强成名成家。他说：“凡人皆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咸丰六年九月二十九夜）又说自己志在读书著述，不克成就，每自愧悔，“泽儿若能成吾之志，将四书五经及余所

好之八种，一一熟读而深思之，略作札记，以志所得，以著所疑，则余欢欣快慰，夜得甘寝，此外别无所求矣。”（咸丰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他反覆叮咛：“银钱田产，最易长骄气逸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尔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咸丰十年十月十六日）“你等长大之后，切不可涉历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尤易于貽万世口实。……尔曹惟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作官。……吾当军事极危，辄将此二事叮嘱一遍，此外亦别无遗训之语。”（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三日）同治五年，纪泽已二十七岁，诗文早已清通，湘乡县修县志举充纂修，国藩也不允许，谕之曰：“余不能文而微有文名，深以为耻；尔文更浅而亦获虚名，尤不可也。”

二、绝不为子女谋求任何“特殊化”。咸丰六年十二月初五日谕纪泽：“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舆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见乡人则嗤其朴陋，见雇工则颐指气使，此即日习于傲矣。……京师子弟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尔与诸弟其戒之，至嘱至嘱。”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谕纪鸿：“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家住乡间，他强调“切不可有宦家风味，……莫作代代做官之想，须作代代做士民之想。门外挂匾，不可写‘侯府’‘相府’字样，天下多难，此等均未必不可。”（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同治三年七月，国藩受封侯爵，纪鸿正赴长沙考试，国藩特别写信告诫：“尔在外以谦逊二字为主。世家子弟，门第过盛，万目所属。……场前不可与州县往来，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对女儿也同样严格，咸丰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信云：“衣服不宜多制，尤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同治二年八月初四日信云：“余每见嫁女贪恋母家富贵而忘其翁姑者，其后必无好处。余家诸女，当教之孝顺翁姑，敬事丈夫，慎无重母家而轻夫家。”

三、无论在读书或做人方面，要求都极其严格，但又不是一味

督责，而是视身教重于言教，根据自身体会，出之以讨论研究的态度，所以指导切实中肯，收效也就十分显著。此类例子，触目皆是，不胜枚举，但选抄其咸丰八年八月二十日谕纪泽一信就足够了：

……余生平有三耻：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涘，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认识，一耻也；每作一事，治一业，辄有始无终，二耻也；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遂致屡变而无所成，迟钝而不适于用，近岁在军，因作字太钝，废阁殊多，三耻也。

尔若为克家之子，当思雪此三耻：推步算学纵难通晓，恒星五纬观认尚易，家中言天文之书，有《十七史》中各《天文志》，及《五礼通考》中《观象授时》一种。每夜认明恒星二三座，不过数月，可毕识矣。凡作一事，无论大小难易，皆宜有始有终。作字时先求圆匀，次求敏捷，若一日能作楷书一万，少或七八千，愈多愈熟，则手腕毫不费力，将来以之为学则手抄群书，以之从政则案无留牍，无穷受用，皆从写字之匀而且捷生出。——三者皆足以弥吾之缺憾矣。

今年初次下场，或中或不中，无甚关系。榜后即当看《诗经注疏》，以后穷经读史，二者迭进。国朝大儒，如顾闳江戴段王数先生之书，不可不熟读而深思之。光阴难得，一刻千金！

以后写安禀来营，不妨将胸中所见、简编所得驰骋议论，俾余得以考察尔之进步，不宜太寥寥，此谕。

百年以来，对曾国藩的评价，从“勋高柱石”的“古今完人”到“汉奸刽子手”，隔若天渊，判如冰炭。这些评价，从不同的时代要求和不同的政治利益出发，各有各的理由，但无论谁都不能不承认曾氏个人的学问和能力。毛泽东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致黎锦熙信中，亦极力推崇曾国藩为有“大本大源”之人：

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虞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而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不管怎样说，曾国藩确有学问和能力，而且他的学问和能力并没有“一世而亡”。虽然他是清王朝的“忠臣”，是传统文化和传统思想的忠实捍卫者，他的哲学和他的方法都无益于现代化的事业，但他教子获得成功却是一个历史事实，无法抹杀，也无须抹杀。

专制制度下的达官贵人如曾国藩者，因为教子有方，“爱之以其道”，还可以使自己的儿子不变成“衙内”和“大少爷”；社会主义时代的父母，只要同样注意教子有方，“爱之以其道”，总应该比曾国藩做得更好一些吧，我想。

（二）关于与弟书

我在出版社任总编辑的时候，主张总编辑应该是出版社的第一编辑。第一编辑当然不仅仅是组稿编辑和案头编辑，而应该自己动手编书，就像过去张元济编《四部丛刊》，叶圣陶编《十三经索引》那样。所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在1984—1988年间，我编了《走向世界丛书》，编了《凤凰丛书》，编了《知堂书话》和《知堂序跋》，此外还编了《曾国藩教子书》和这本《曾国藩与弟书》。

《曾国藩教子书》初版于1986年2月，署名“钟叔河选编”，封四上同时做了《与弟书》的广告。《教子书》印出来后，读者反应还算热烈，但出版社内部却出现了不同意见，随即我便离开了原来的工作岗位，于是这本《与弟书》直到现在始得在北京出版。从1986年以来，先后有数百位读者来信询问《与弟书》何时印成，要至何处才能买到，因为答复有些为难，绝大部分我都没有回信，特趁此机会，向一切关心本书的读者表示衷心的歉意和谢意。

本书和《教子书》一样，都是曾国藩家书的选本而非全本。曾氏家书数量很多，研究历史的人应该全部都看，普通读者却无此必

要。有的信内容重要，或文字有趣，但也可删去一些次要的句、段，以节约篇幅。1949年以前通行本曾氏家书，也就是这样做的。但通行本所根据的原刻本出于当时种种原因（例如为尊亲讳）而有意不收的信件，本书则特别注意编入，而且尽量不加删节。现在家书全集本和旧时通行本都已出版，读者如有兴趣，不妨将各本对照一下，然后各取所需。

关于曾国藩的与弟书，刘伯承对薄一波说过这样一段话：

这位“曾文正公”，其人不可取，但也不要因人废言。他的家书，也并非都是腐儒之见，其中有些见解，我看还是可以借鉴的。比如说，他给他的弟弟曾国荃写过不少的信，其时曾国荃镇守南京，已是万军之将。曾国藩在信中一条是劝他戒躁，处事一定要沉着、冷静、多思；另一条是劝他要注意及早选拔替手……

听了之后，薄一波补充道：“曾国藩讲的这两条，作为治军为政之道，不无道理。”（见1989年4月13日《人民日报》）

曾国藩与弟书所谈的确多是治军为政之道，和教子书多谈读书作文之法不同。曾国藩、曾国荃的治军为政，与刘伯承、薄一波的治军为政，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和所担负的历史使命是不同的，但如“处事一定要沉着、冷静、多思”，“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这类方式方法也就是战略策略，则古今前后尽可相通，故刘伯承觉得可以借鉴，薄一波认为不无道理也。

古时的帝王将相、卿士大夫、墨客词人、儒生才子，都是过去了的人物，属于过去的时代。曾国藩效忠爱新觉罗皇室，消灭太平军，故无产阶级谓其人不可取，而其思想体系固无以异于其他士大夫。现代化无须熟读离骚，当然也无须熟读曾国藩家书，因为它决不能指引我们走向明天的世界。但是，它虽不能指引我们走向明天，却很能指引我们了解昨天和前天，即了解旧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旧中国的统治阶级，有它的统治思想和统治方法，这就是以儒

为体，以法为用，以黄老为权，以纵横为变，在这方面，曾国藩有很深的研究和心得。他是儒生而非腐儒——书呆子，其成功主要得力于对传统政治权术和谋略的运用，《与弟书》便是他最充分、最坦白、最没有保留地同他的弟弟进行交流的记录，这本书确实是他作为一个政治人物讲出来的私房话。

当然，每个真心希望中国现代化的人，对于在旧中国实行专制统治的帝王将相，以及为其制礼作乐、出谋划策的形形色色的“士师”们的政治谋略和政治权术，上起韩非、李斯、秦皇帝，下至慈禧太后、曾国藩……，从理性上到感情上都不可能不深恶而痛绝之（至于其他方面，古人当然不乏可取之处，如刘、薄所说的两条，又如曾国藩的严以教子）。然而，欲求中国之现代化，尤其是愿意多思考中国的历史和未来的人，却非认真研究和剖析这种代代心传的法术不可，其理自明，无须多说。

中世纪的欧洲有一位“士师”马基雅弗利，曾将他研究总结出来的君王统治经验写成一本《君王论》献给他的君王。此人在生前并没有得到很多奖赏，死后却得到了很大的名声。我觉得这本《曾国藩与弟书》，谈的虽非君王统治之术，却是将相统驭之道，故可称为中国的《将相篇》，与马氏的《君王论》相提并论。关于这件事今后也许还可以再谈谈，兹不复赘。

（三）关于世界书局本

曾国藩家书初刊于1879年，即曾国藩死后七年的清光绪己卯年，由长沙“传忠书局”印行。这虽非曾氏家书的全部，但却是过去传世通行唯一的本子，影响很大，所以至今仍有保存的价值。

俄谚有云，一滴水可以反映出太阳，那么一部书的起跌浮沉，也多少可以反映出一点时代和人们价值观的变化，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曾国藩家书问世以来的情况吧。

从1879年到1949年七十年间，曾国藩家书几乎是每个读书人必读的书，那时候叫《曾文正公家书》。

当时读书人对这部书所抱的态度，又可以 1917 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四十年的主流是仰慕和效法，虽说在辛亥前后，由于排满的影响，有些人对曾国藩替爱新觉罗氏朝廷出力不能原谅，但对他仰事父母、下教子弟这方面，大都还是充分肯定的。到了后三十年，西潮东渐，吴虞“只手打倒孔家店”，施存统作《非教》，“父父子子”的传统观念从根本上发生动摇，尽管老一派的人还在佩服“曾文正”、“胡文忠”，新一派知识分子却已看出，这些人的时代是一去不返了，而为了挣脱传统的束缚，却又非把传统的偶像拿来加以剖析研究不可。

总之，不管前期后期，旧派新派，从 1879 年到 1949 年，曾国藩家书一直是读书人所必读的书。

这个情况，到 1949 年后，才发生一个根本的改变。虽然毛泽东 1917 年说过他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范文澜却在 1947 年宣布曾国藩是“汉奸刽子手。”从此，过去七十年间广泛流传的曾国藩家书，在 1949 年到 1979 年三十年间一变而销声匿迹，就是想要“借鉴”也无从得到了。

传统的封建文化不能导向民主与科学，中国之现代化无须熟读《离骚》，是我四十年来一贯的观点。但是我同时又认为，为了快步地走向明天，必须深刻地认识昨天，清醒地面对今天。如果不查明遗传因子带给我们的先天性弱点，不找出潜伏在我们大脑皮层和心肝血管里的病根，就不可能造成健康的自我和健康的后代。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过去的文化积淀，我们都有责任加以清理；越是过去产生过大的影响的东西，越有必要加以重视和研究。从孔夫子到胡适之都是如此，曾国藩亦不例外。

站在“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的立场，骂曾左彭胡诸人为“刽子手”，一点也不过分。但是汉奸这顶帽子戴在曾国藩头上却似乎并不十分妥帖。曾国藩生于 1811 年，上距崇祯皇帝吊死煤山已经一百六十余年，中国由满族人做皇帝已历顺康雍乾嘉五世，从他的

爷爷的爷爷起即是清朝的臣民了。辛亥革命后实行的也是五族共和，满洲并非外国。即使站在崇祯、弘光的立场，把洪承畴、吴三桂等“贰臣”称为汉奸则可，把嘉道咸同时期食朝廷俸禄为国家办事的人称为汉奸则不可。如果曾国藩算汉奸，胡林翼左宗棠自然也是汉奸，林则徐魏源等都是汉奸，严复康有为更是汉奸，连“扶清”的大师兄们也只能算是充当“志愿军”的汉奸，汉奸亦未免太多矣。

退一步说，即使曾国藩经过清查定案，确实应定为汉奸，汉奸的文献恐怕也仍然需要整理研究，尤其是对于那些在当时曾起过重大作用（即使完全是坏的作用）、对后世仍然有重大影响（即使完全是坏的影响）的人，就更应该如此。历史是一门科学，研究科学不能“跟着感觉走”，全凭感情。即使把历史研究降低到编演旧戏的水平，舞台上也不能只有红脸而无白脸，只有阿庆嫂江水英而无刁德一王国禄也。

基于以上认识，我于1979年到湖南省出版局工作后不久，即提出整理出版《曾国藩大全集》（包括已刊未刊的全部家书）的建议。1982年初，在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会上，我又一次就这个问题作了发言。同年8月23日，经国务院批准公布的1982—1990《古籍整理出版规划》，正式将影印《曾文正公全集》和出版《曾国藩外集》（辑佚）列为项目。这次应出版社之约，将旧时通行本《曾文正公家书》校点重印，是为了给等不及全集出齐和买不起全集的读者，提供一个比较精简的本子。至于书名，“曾文正公”自不适用，就理所当然地改称为《曾国藩家书》。

一切旧时通行本《曾文正公家书》的底本都是光绪己卯传忠书局刻本，但原刻本也有错误。如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的与四位老弟书，原刻本卷一第三十页上第三行第四字起是：

子思朱子言为学譬如熬肉先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漫火
温予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过……

几乎所有过去的标点本都印成：

子思、朱子言：为学譬如熬肉，先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漫火温。予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过……

细心的读者看了也许会纳闷，公元前四百多年的人，怎么和公元后一千二百年的人站在一起说话呢？“为学譬如熬肉”，“猛火煮，漫火温”，确肖宋儒口吻，先秦亦不可能有此等文字也。

我前前后后翻看过近十种标点（断句）本，只发现一种本子即民国二十五年上海世界书局的印本改正了刻本的错误：

子思朱子言。为学譬如熬肉。先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漫火温。予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过……

原来原刻本把“予”误成“子”，世界书局本把它改正，这才文从字顺，读得通了。

世界书局本并非原刻足本，它有删节，但保存了最重要的信件，尤其是与祖父、父母、叔父的信和早年与诸弟的信很少删，它虽然没有能够改正原刻本所有的错误，但毕竟改正了一些，“子思朱子”便是例。因为我采用了它的这些成绩，为了尊重前人，不敢掠美，我决定将整理校点的这本《曾国藩家书》叫做“世界书局本”，以别于原刻足本。

最后，我还想重复以下两句话：

曾国藩是已经崩坏的旧中国大厦的一根支柱，新中国的建设者们用不着学习他的著作，包括他的家书，但是却无妨偶而看看，为的是更好地了解过去，了解历史，在这一点上，我们和从曾国藩那里学会“修齐治平”道术的袁世凯、蒋介石们是根本不同的。

曾国藩家书作为历史文献的价值，当然要求一个全字，所以建议历史研究者最好去看全集本的家书，这部《曾国藩家书三种合编》只是为想大概了解一下曾国藩的人而编的，只是一个选编本，不敢挂羊头卖狗肉，更不敢说狗肉只有我烧的好也。

一九九四年五月十日夜十二时

目 录

序 言 钟叔河(1—10)

曾国藩教子书 (1—164)
(咸丰二年——同治十年)

曾国藩与弟书 (165—574)
(道光二十二年——同治十年)

曾国藩与祖父、父、叔书 (575—668)
(道光二十一年——同治二年)

咸丰二年

●家中丧事不可多受人情。

七月二十五日

字谕纪泽儿：

七月二十五日丑正二刻，余行抵安徽太湖县之小池驿，惨闻吾母大故。余德不修，无实学而有虚名，自知当有祸变，惧之久矣。不谓天不陨灭我身，而反灾及我母，回思吾平日隐慝大罪不可胜数，一闻此信，真无地自容矣。小池驿去大江之滨尚有二百里，此两日内雇一小轿，仍走旱路，至湖北黄梅县临江之处即行雇船。计由黄梅至武昌不过六七百里，由武昌至长沙不过千里，大约八月中秋后可望到家。一出家辄十四年，吾母音容不可再见，痛极痛极！不孝之罪，岂有稍减之处。兹念京寓眷口尚多，还家甚难，特寄信到京，料理一切，开列于后：

一、我出京时将一切家事面托毛寄云年伯，均蒙慨许。此时遭此大变，尔往叩求寄云年伯筹划一切，必能俯允。现在京寓并无银钱，分毫无出，不得不开吊收赙仪，以作家眷回南之路费。开吊所得，大抵不过三百金，路费以人口太多之故，计须四五百金，其不足者，可求寄云年伯张罗。此外同乡如黎樾乔、黄恕皆老伯，同年如王静庵、袁午桥年伯，平日皆有肝胆，待我甚厚，或可求其凑办旅费。受人恩情，当为将来报答之地，不可多求人也。袁漱六姻伯处，只可求其出力帮办一切，不可令其张罗银钱，渠甚苦也。

一、京寓所欠之帐，惟西顺兴最多，此外如杨临川、王静安、李玉泉、王吉云、陈仲鸾诸兄皆多年未偿，可求寄云年伯及黎、黄、王、袁诸君内择其尤相熟者，前往为我展缓，我再有信致各处。外间若有奠金来者，我当概存寄云、午桥两处。有一两即以一两还债，有一钱即以一钱还债。若并无分文，只得待我起复后再还。……

一、开吊散讣不可太滥，除同年同乡门生外，惟门簿上有来往

者散之，此外不可散一分。其单请庞省三先生定。此系无途费，不得已而为之，不可滥也；即不滥，我已愧恨极矣。

一、外间亲友，不能不讠告寄信，然尤不可滥，大约不过二三十封。我到武昌时当寄一单来，并寄信稿，此刻不可遽发信。

一、铺店帐目宜一一清楚，今年端节已全楚矣。此外只有松竹斋新帐，可请省三先生往清，只可少给他，不可欠他的出京。又有天元德皮货店，请寄云年伯往清。其新猗猗猗皮褂即退还他，若已做成，即并缎面送赠寄云可也。万一无钱，皮局帐亦暂展限，但累寄云年伯多矣。……

咸丰二年
九月十八日

●居乡即全守乡间旧样，不参半点
官宦气习。

字谕纪泽儿：

余于二十三日到家，家中一切皆清吉，父亲大人及叔父母以下皆平安。余癖疾自到家后日见痊愈。地方团练，我曾家人人皆习武艺，外姓亦多善打者，土匪决可无虞。粤匪之氛虽恶，我境僻处万山之中，不当孔道，亦断不受其蹂躏。现奉父亲大人之命，于九月十三日权厝先妣于下腰里屋后山内，俟明年寻有吉地再行改葬。所有出殡之事，一切皆从俭约，惟新做大杠六十四人舁请，约费钱十馀千，盖乡间木料甚贱也。请客约百馀席，不用海菜。县城各官一概不请，神主即请父亲大人自点。

丁贵自二十七日已打发他去了，我在家并未带一仆人，盖居乡即全守乡间旧样子，不参半点官宦气习。……

十三日申刻，母亲大人发引，戌刻下殓。十二日早响鼓，已刻开祭，共祭百馀堂。十三日正酒一百九十席，前后客席甚多。十四日开口，客八人一席，共二百六十馀席，诸事办得整齐。母亲即权厝于凹里屋后山内，十九日筑坟可毕。现在地方安静，闻长沙屡获胜仗，想近日即可解围。尔等回家，为期亦近矣。……